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张力与平衡—历史维度下阿诺德“两希”精神中的平衡理想

杜鑫虹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一文中，对这“两希”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反对通过贬低希腊精神来提升希伯来精神地位的做法，认为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内在的和谐与完美。现代社会以功利为导向，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状况相似。从历史维度出发，探讨阿诺德对两种精神的评论并从中汲取经验，可以为矫正功利主义倾向提供启示，引导人们将追求的目标回归到人和谐且完美的发展。

关键词：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历史维度

0 前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是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杰出诗人、教育家和批评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批评散文，致力于文化传播和社会和谐发展。此外，阿诺德还撰写了许多关于文学、文化和宗教的批评性散文。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1994[9]，以下简称为《文化》）的《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Hebraism and Hellenism，以下简称为《希伯来精神》）一文中，他对比了以理性和智慧为代表的希腊精神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伯来精神，分析其优劣，以期为当时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阿诺德的诗歌、批评散文和宗教研究无不展现了他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审视社会弊端，并通过理性的批判切中要害，其思想对西方文化与批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阿诺德的思想深受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在他的论述中，历史思维成为一种核心的分析方法。历史思维作为人类基本的思考方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借鉴历史以解决当下问题，并为未来提出可行方案。马修·阿诺德在其文化批判中展现了鲜明的历史思维，通过追溯思想源流来审视当下、烛照未来。为把握其理论精髓，本文将首先回溯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语境，考察当时学界对“两希”精神的探讨如何成为阿诺德思想的渊源与参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深入剖析阿诺德“两希”精神观的核心要义及其理论创见。

“两希”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一直被视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二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互动与融合中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进程。希腊文化起源于爱琴文明，崇尚自然与理性，追求知识与智慧。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文化中的神话，与其说是关于“神”的传说，不如说是一群有着高强法力的“人”的故事（谢璐妍 唐琦，2014：195）[16]。希腊神话中的神祇个性鲜明、追求自我、向往自由，肯定人的世俗欲望与生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同样不畏艰难、百折不挠，敢于向命运抗争，体现了希腊文化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乐观精神。更重要的是，古希腊文化为西方文明注入了追求真理的批判性智识基因，它鼓励对世界本源的自由探究，并高度彰显人的主体地位。这一宝贵的思想传统虽在中世纪一度式微，却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辉煌的重生，人文主义的浪潮正是希腊精神中尊崇“人”之价值的伟大回响。正是这种对理性、自然与人自身的深刻关切，赋予了古希腊文明以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若说希腊文化奠定了西方的理性基石，那么希伯来文化则浇筑了其信仰的框架。它源于犹太民族的一神信仰，强调人对神圣秩序的服从与敬畏。后来的基督教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并将这种对信仰的绝对忠诚推广至整个西方世界。因此，希伯来文化中带有强烈的宗教精神，而“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的原始欲望则被视为人之‘原罪’而受到抑制”（曹万忠，2012：56）[12]。希伯来精神传统建立在一个核心观念之上：它将人类的苦难归因于对某种超验神圣秩序的偏离。因此，获得救赎的路径被设定为通过虔诚信仰和严格的道德规训，来规范个体行为，以期最终达成灵魂的超越与来世的安宁。这种以信仰、良知和道德意志为重心的宗教意识，在数千年的演进中深刻地渗透到西方社会的诸多层面，成为塑造其文明特质与伦理观念的关键精神源泉之一。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1 阿诺德“两希”精神思想溯源

西方思想界对“两希”精神的探讨从未停止。从古希腊的先哲到罗马帝国的衰落，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始终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阿诺德敏锐地观察到，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整个世界就在它们的影响下运转，在一个时期世界会感到一种力的吸引力更大，另一个时期则是另一种力更受瞩目（阿诺德，2002：111）[11]。根据阿诺德本人的书信，阿诺德的古典文化思想深受其父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的影响，最早可追溯至阿诺德受教育的时期。阿诺德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曾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 14 年，对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拉丁文学颇有研究，著有《罗马史》（History of Rome，1845）[10] 和一些布道文章，在担任校长期间还以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对拉格比公学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托马斯·阿诺德对儿子的教育大部分以古典文学为主。马修·阿诺德的研究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对阿诺德的父亲做出评价：现代社会对马修·阿诺德的父亲并不友好（Trilling，1949：39）[6]，而这恰恰成为马修·阿诺德本人思想斗争的起点。这表明，阿诺德继承了父亲对古典文化的关注，并将其作为审视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

1841 年，阿诺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当时的牛津运动正处于发展时期，牛津运动并不只是一场精英思想运动，更对英国宗教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旨在对教会进行改革，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思想观念。阿诺德在书信中和其批评文章中曾提到：牛津运动的领袖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对其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身为牛津运动领袖、19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与教育家，纽曼在教会和英国宗教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著有《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2014）[17]，对基督教的历史与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纽曼对希伯来精神中的信仰、服从与道德观念有着深刻理解，并认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他是一个看、感觉、思考、行动的动物。知道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海涅，2003）[14]。纽曼依赖于神学来反驳“知识是提高道德的一种手段”的观点，其立场明显倾向于希伯来精神。尽管深受纽曼宗教思想的影响，阿诺德对“两希”精神的看法却与他不同。相较于纽曼对希伯来精神的偏爱，阿诺德认为，维多利亚社会已经充斥着过度的希伯来精神，当务之急是重新将注意力引向希腊精神，回归知识与理性。

另一位对两希精神颇有研究且对阿诺德的两希精神观点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就是德国抒情诗人、散文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在阿诺德发表的《评论一集》（Essays in Criticism，1865）[7] 中，对海涅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名为《海因里希·海涅》。在《海涅》一文中，阿诺德指出海涅曾将 16 世纪的复兴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希腊式与希伯来式。这一说法出自海涅为舞剧脚本《浮士德博士》（Der Doktor Faust Reclam，1991）[5] 所做的说明（崔洁莹，2014：37）[13]。在《海涅全集》[14] 的一篇散文作品《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中，海涅对两希精神的叙述更为集中。在海涅看来，人类由两种人组成，一是以奉行禁欲主义为代表的犹太人，二是以注重理性、现实、智慧为代表的希腊人。这两种人从天性的本能上互相反感。阿诺德的“两希”精神理论，其思想谱系可追溯至海涅。他并非简单地沿袭海涅的观点，而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其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重构与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2 阿诺德对“两希”精神的批判继承

古典文化是贯穿阿诺德整个创作与研究生涯的核心线索。尽管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思想体系是连贯统一的。从早期诗歌到后期的批评散文，阿诺德对“两希”精神的思考不断深化，从最初对古希腊经典的简单引用，发展为对古典文化的系统性批判。阿诺德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也大量涉及古典文化和神话故事。例如，在其名作《多佛海滩》（Dover Beach，1925）[8] 中引用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形象，将古代文明的精神注入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审视之中，含蓄地将“两希”文化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进行对比。这一引用并非偶然，它不仅引导读者思考两种精神的差异，也为阿诺德后续在《文化》中提出以希腊精神改造社会信仰埋下了伏笔。阿诺德的思想极好地应了维多利亚时期以前的传统文化，且迎合了即将到来的 19 世纪的文化内涵（Delaura，1969）[2]。同样，在诗歌《菲洛墨拉》（Philomela，1925）[8] 中，他借用希腊神话中菲洛墨拉泣诉暴行的故事，寄托了自己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感慨和对社会不公的控诉，直接表达了对古希腊文化中美好品质的向往 。

在阿诺德看来，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就大量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的元素，而希伯来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也深刻影响了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在《希伯来精神》一文中，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阿诺德明确指出：人的智性冲动和道德冲动交替出现……两种力各有属于自己的辉煌，各有一统天下的时光。如果说伟大的基督教运动是希伯来精神和道德冲动的胜利，那么被称作“文艺复兴”的那场伟大运动就是智性冲动和希腊精神的再度崛起和复位（阿诺德，2002：120）[11]。相对于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的优点只体现在道德上的优越，而并没有继承文艺复兴思想的精髓，即：如实看清事物的本相。

历史上，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此消彼长，相互作用推进人类进程的发展。希腊精神在英国借由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鼎盛，而希伯来精神则由宗教改革重新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1944–2010）也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1984）[4] 中指出，学界对 19 世纪英国史的研究大多关注基督教传统，而较少探讨希腊传统与英国文化的关联。[14]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阿诺德试图修正社会对希伯来精神的过度侧重，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希腊精神。《文化》的中心意图是定义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将通过某种方式将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即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的极端，以更高的综合形式结合起来，从而消除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的历史冲突（DeLaura，1969：60）[2]。在阿诺德看来，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差异虽不可混淆，其目标却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实现人的和谐、平衡的完美。因此，这两种精神并非终极目的，而是达成此目的的两大基本手段。它们构成了人在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道路上所依赖的两条并行且互补的路径。

3 动态平衡与和谐共存

阿诺德在《文化》中反复强调两者达到平衡的重要性，他真正的理想是在张力中寻求和谐。在《文化》中，阿诺德写道：“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均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阿诺德，2002：111）[11]。因此，阿诺德认为“两希”文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同促进人类向着“美好与光明”前进的两种动力。虽然两者实现路径不同，但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达到人内在的和谐与完美。

阿诺德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力推崇希腊精神，是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也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庸俗的市侩气息之中。他以理智的目光和冷静的心态看到在崇尚物质和功利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文明已毫无立锥之地整个社会充斥着庸俗和市侩的气息（吕佩爱，2006：90）[15]。人们过分自信，沉迷于追求个人主义的物质利益，却忽视了精神世界的同步发展。加之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生物进化论》（The Origin of Species，1959）[1] 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巨大冲击，整个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阿诺德在《希伯来精神》中开篇便点明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最根本的习性在于偏爱行动而不是思考（阿诺德，2002：110）[11]。这种对“行动”的过度偏爱，正是希伯来精神在当时社会被异化的表现，导致了拜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因此，阿诺德呼吁重构社会信仰，而他选择的“药方”，正是以希腊精神所倡导的“如实看清事物的本相”来矫正时代的偏失。

阿诺德对希腊精神的倡导，并非意在贬抑或彻底取代希伯来精神。他从来没有把希腊人强调的“知”和希伯来人强调的“行”分开（Stone，1998：179）[3]。在阿诺德眼中，希腊精神的璀璨光明必须以希伯来精神的道德基石为前提。在《文化》中，阿诺德指出：人的德行、自制足完美之不可或缺的根基，只有筑起自律的台基，希腊人所追求的完美才会枝盛叶茂（阿诺德，2002：117）[11]。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任何一种精神的单方面胜利都无法导向理想状态。因此，二者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是构成个体人格完善与文化健全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阿诺德所真正倡导的，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共存。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中所倡导的“如实看清事物的本相”与“严正的良知”，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成长和自我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鼓励人们不断追求知识、提升道德水平、培养审美能力并关注自身健康，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阿诺德关于“两希”精神的论述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希腊精神所倡导的理性、科学与审美，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希伯来精神所强调的道德、信仰与责任，则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石。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丰富而多样的图景。阿诺德对这两种精神的辩证理解极具启发性。他既推崇希腊精神中对美、智慧和真理的追求，也同样重视希伯来精神中的自制与道德准则。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代表了“意识的自发性”，追求如实地认识事物；而古希伯来文化则代表了“良知的严正性”，要求人们严格地服从道德律令。阿诺德的真正理想，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通过矫正特定时代的精神

ISSN：3078-8994
EISSN：3104-4492

偏失，最终引导社会朝向完美的目标迈进。这一思想不仅是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深刻回应，也为我们反思当下社会的功利主义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参考文献：

[1]Charles Darwin. (1959).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1959 [J]. Bios, 30(2): 67−72.

[2]David DeLaura. (1969). Hebrew and Hellene in Victorian England : Newman, Arnold, and Pater [M].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Donald D Stone. (1998). Matthew Arnold and the pragmatics of Hebraism and Hellenism [J]. Poetics Today, 179−198.

[4]Frank M Turner. (1984).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Heinrich Heine. (1991). Der Doktor Faust Reclam [M]. Siemensstr: Philipp, jun. GmbH, Verlag.

[6]Lionel Trilling. (1949). Matthew Arnold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Matthew Arnold. (1865). Essays in Criticism [M]. London and Cambridge: Macmillan.

[8]Matthew Arnold. (1925). The Poetical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M]. New York：T.Y. Crowell.

[9]Matthew Arnold. (1994).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M]. Ed. Samuel Lipman. New Haven：Yale UP.

[10]Thomas Arnold. (1845). History of Rome [M]. London: B, Fellowes; F. and J. Rivington; E. Hodgson; G. Lawford; J. M.Richardson; J. Bain; and S. Hodgson: ALSO, J. H. Parker, Oxford; and J. and J. J. Deighton, Cambridge.

[11] 阿诺德 .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M]. 韩敏中 (译). 北京：三联书店 . 2002.

[12] 曹万忠 .《莎乐美》：“两希”传统的冲撞与交融 [J]. 四川戏剧 , 2012(5)：56−58.

[13] 崔洁莹 . 现代思想的体现者和诠释者——论阿诺德的《海因里希・海涅》[J]. 国外文学 , 2014(1)：34−40+157.

[14] 海涅 . 海涅全集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3.

[15] 吕佩爱 .“信仰之海”潮退的哀歌——读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J].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89−91+128.

[16] 谢璐妍 唐琦 . 从“两希”神话探索西方文化精神 [J]. 学术交流 , 2014(5)：195−198.

[17] 约翰・亨利・纽曼 . 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M]. 王雪迎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4.

作者简介：杜鑫虹（1999，1—），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项目信息：2024 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整体的完美——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编号：YJSCX2024−046）。